



COLLECTED ARTICLE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MING CHINA UNDER A PERSPECTIVE OF GLOBAL TRANSFORMATION

世界大变迁 视角下的明代中国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主编／赵铁峰 万 明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世界大变迁视角下的明代中国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Collected Article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Ming China under A Perspective of
Global Transformation

主编：赵轶峰 万 明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大变迁视角下的明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赵轶峰, 万明主编.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206-08897-1

I. ①世…

II. ①赵… ②万…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明代—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K248.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87383号

世界大变迁视角下的明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主 编:赵轶峰 万 明

责任编辑:杨九屹 封面设计:张 娜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130022)

印 刷:长春市利源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34 字 数:600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08897-1

版 次:2012年6月第1版 印 次: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6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编辑说明

2009年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主任万明研究员与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商传研究员及部分高校明史学者议定，每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与一个地方研究机构合作召开一次小规模的明史专题会议，以对若干共同关注的研究话题进行比较集中深入的讨论。2010年6月，第一次这样的明史专题会议在厦门大学召开，会议的主题为“明史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会议期间议定第二次明史专题会议在长春举行，由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明清史研究所共同承办。

2011年6月26日至29日，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韩国首尔大学、澳门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行政学院、故宫博物院、南京大学、吉林大学、江西师范大学、黑龙江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高校、科研院所的30余位明史专家学者来到长春，共同参与了以“世界大变迁视角下的明代中国”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

这次会议的组织者认为，明代（1368—1644年）经历的276年间，整个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在郑和率领巨大的船队进行了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航海之后，欧洲人发现了绕过好望角的新航路，“发现”了美洲大陆并逐步实现向美洲的殖民，美洲的白银被输入欧洲、亚洲，带来欧亚经济体系的大变革，整个世界日益紧密地联系起来，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方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这样一个人类生存方式发生全球性转变的时代，中国究竟在发生什么，中国的国家制度、思想文化、经济体系、社会生活、对外关系、科学技术处于怎样的状态，那种状态与正在发生的世界大变迁如何关联，那些关联对于后来中国的历史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学术话题。国际学术界早就在关注这类话题，并且已经提出了诸多研究成果。尽管如此，在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新的挑战、新的发展机遇的时候，参照人类

晚近的经验，对这些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研讨，仍是必要的。

会议收到论文 34 篇，参照 14 世纪至 17 世纪世界变迁的总体背景，分别从明代中国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该时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形态与特色、明代政治体制中发生的变化、明代中国社会经济中新旧因素的纠结、中外思想文化的互动关系、中外海上力量对比的格局、明蒙关系及其向欧亚腹地延伸的影响、明代边疆军政体制与朝贡贸易体制的形成与演变、明代思想著述的成就与特点等方面，进行了热烈、坦率的讨论，显示出当代中国明史学界在该领域的一些新的研究动向。兹将会议论文汇集出版，以供更大范围的学者参考。

此集共收论文 29 篇，依据其主题分列 4 个题目之下：一、明代的历史地位及其政治、社会、文化变迁，8 篇；二、明代中国在世界大变迁中的位势，7 篇；三、明代中国的边疆与近邻，6 篇；四、明代的公共观念与社会组织建构及其变迁，8 篇。另有陈时龙、刁书仁、刘晓东、赵中男、[韩] 金暻绿 5 位学者拟对提交会议的文章做进一步修改，未收入此集。所有论文需要采用统一版式和注释方法，因而编辑过程中对一些论文原来的注释方式有些改动，补充了一些按本论文集标准缺失的类项信息，对疑误文献也进行了核对，更正了一些误字、标点等。但编者对原作观点、行文，未做任何删改或增润。各位学者原来所用同种文献之版本有所不同，编辑过程中只对单篇论文内同文献版本进行统一整理，并未强求全集统一，以免牵动原作基本面貌。李媛、刘波、王慧明、李莹石等协助编者进行了整理校对方面的工作，在此致谢。

编者

2011 年 12 月

目 录

一、明代的历史地位及其政治、社会、文化变迁

南炳文	过去、当代、未来三个角度看明朝	
	——喜悦、自豪及遗憾	3
方志远	明朝百年启示录	12
陈支平	从文化传播史的角度看明代的历史地位	20
[韩] 吴金成	从社会变迁视角对明中期史的再认识	27
商 传	晚明国家异化的历史思考	53
张献忠	救亡压倒启蒙	
	——晚明至清初启蒙思潮演变的路径及其阐释	63
罗冬阳	势要占窝	
	——明中叶盐法变迁中的市场、权力与资本	80
赵轶峰	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论纲	96

二、明代中国在世界大变迁中的位势

万 明	晚明海上世界的重新解读	
	——商品、商人与秩序	115
王日根	苏惠苹 隆庆开海与福建海洋区域贸易的国际化	142
夏维中	冯洪河 郑玉超 南京大报恩寺及其琉璃塔在海外的影响	162
李伯重	万历后期的盔甲厂与王恭厂	
	——晚明中央军器制造业研究	170
汤开建	张中鹏 徐光启与利玛窦之交游及影响	211

庞乃明	环球大视野与晚明新思维	231
彭 勇	从“文献郑和”到“文化郑和” ——近十年国内外郑和研究评述	244

三、明代中国的边疆与近邻

赵世瑜	时代交替视野下的明代“北虏”问题	263
胡 凡	明蒙朝贡体制与明代农牧文化融合	282
李新峰	明初辽东战争进程与卫所设置拾遗	296
赵现海	明前期西北地区的边缘化与河套周边的经营	313
章宏伟	《嘉兴藏》的刊刻及其在日本的流播	349
刘婷玉	内无应援，未有能立功名于外者 ——由俞大猷抗倭期间的得咎、起复谈起	370

四、明代的公共观念与社会组织建构及其变迁

赵克生	从“木铎宣诵”到“乡约会讲” ——明代地方社会的圣谕宣讲	385
李 媛	塑像与木主：明朝祭孔形象的变迁及其原因	406
王 剑	明懿文太子陵陵祭逾制考论	423
解 扬	晚明经世类书编纂的实用追求 ——以冯琦（1558—1603）《经济类编》为中心	439
余清良	明代“铺”、“境”、“社”含义考辨 ——以福建地区为例	468
高寿仙	“行业组织”抑或“服役名册” ——宋代“团行”和明代“铺行”的性质与功能	489
张金奎	明代山东地区枣强裔移民考	507
张兆裕	《崇祯长编》佚文述记	522



明代的历史地位 及其政治、社会、文化变迁

过去、当代、未来三个角度看明朝

——喜悦、自豪及遗憾

南炳文*

明朝存在近 300 年，在历史上发生过重大影响，正确评价之，不仅在学术上有其价值，而且有利于后人从中吸取启示。但对其评价凡有二类。一为肯定。明朝当代人曾给予很高的评价，如宣德年间郑和所立长乐《天妃之神灵应记》碑称：“皇明混一海宇，超三代而轶汉唐，际天极地罔不臣妾。”^①嘉靖年间海盐人董谷曾以“椒房不预政事”等七事，论证明朝“超越前代”。^②比董谷稍晚，原籍江西吉安、生于南京的刘仕义曾以“兵柄有统、鲜悍将拒命之患”等五事，论证明朝“超越前古”。^③此后对明朝仍有给予较高评价者，如民国年间孟森先生曾在《明史讲义》第一章《开国》中，赞扬明朝得国之正及制度影响之大。称：“中国自三代以后，得国最正者，惟汉与明”；“明祖有国，当元尽紊法度之后，一切准古酌今，扫除更始，所定制度，遂奠二百数十年之国基”；（清朝）“不过能师其万历以前之规模，遂又奠二百数十年之国基。清无制作，尽守明之制作，而国祚亦与明相等”。^④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李洵先生也曾指出：“明清时期的历史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⑤台湾学者陈进传先生更撰《明史地位及其研究意

* 【作者简介】南炳文（1942 年—），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历史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史。

① 郑和下西洋六〇〇周年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编：《郑和下西洋文选（1995—2005）》，北京：海洋出版社，2005 年，第 177 页。

② 董汉阳：《碧里杂存·本朝超越前代》；樊维城：《盐邑志林》卷 28，民国上海涵芬楼影印明刻本，第 17 册，第 27 页。

③ 沈节甫：《纪录汇编》卷 216，《新知录摘抄·国朝超越五事》，民国上海涵芬楼影印明刻本，第 76 册，第 146 页。以上两人事，郑克晟先生已有《论董谷刘仕义之明朝“超越前代”说》专文，载《中国历史与史学》，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年。

④ 孟森：《明史讲义》，北京：中华书局，2006 年，第 19 页。

⑤ 李洵、薛虹主编：《明清史》前言，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1 页。

义》专文，从“海洋时代”等10个方面，对明朝的成就进行详细的阐述。^①

另一类为否定。从明朝灭亡后，对于明朝给予负面评价者数量极多。如《四库全书总目》卷53所载张瑄《南征录》提要称：“明人积弱，自其盛时已然。”^②日本学者大岛利一在其《天工开物的时代》一文中提到有一些学者认为明代“怎么看也好像感到缺乏精彩”。^③意大利学者翁贝托·梅洛蒂称：（明代中国已处于）“一种深刻而危险的停滞局面”，“跟不上同时代欧洲的发展”。^④雷海宗先生称：“有明三百年间，由任何方面看，都始终未上轨道，整个的局面都叫人感到是人类史上的一个大污点……整个民族与整个文化已发展到绝望的阶段。”^⑤黄仁宇先生称：（明朝实行的）“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⑥

对明朝究竟应作何种评价？笔者从总体上讲是站在了“肯定者”之列，不过肯定的着眼点和细节与其他“肯定者”或有不同之处。笔者以明朝所处时期为时间基准划分“过去”、“当代”和“未来”，认为以“过去”的角度对比“今昔”，结论为“有所前进，令人喜悦”；以“当代”的角度对比中外，结论为“富强先进，值得自豪”；以“未来”的角度注视后果，结论为“丢失机遇，留有遗憾”。以下将笔者的见解，稍加具体说明，期望得到读者的指正，并为推进关于明朝评价的研究，献出绵薄之力。

一、以“过去”的角度对比“今昔”：有所前进，令人喜悦

明朝由于结束了元代那种广大汉人遭受民族压迫的局面，又由于建国后采取休养生息政策使相当长时期内保有数量颇多的自耕农，因而近三百年中

① 陈进传：《明史地位及其研究意义》，载吴智和主编：《明史研究论丛》第一辑，台北：大立出版社，1982年。

② 张瑄：《四库全书总目》卷53，《南征录》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77页。

③ 大岛利一：《天工开物的时代》，载戴内清等编，章熊、吴杰译：《天工开物研究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37页。

④ 翁贝托·梅洛蒂：《马克思与第三世界》，转引自沈定平：《从国际市场的商品竞争看明清之际的生产发展水平》，载《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3期。

⑤ 雷海宗：《断代问题与中国史的分期》，载《社会科学》，1936年2卷1期。

⑥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自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3—4页。

虽有一些战争，但大部分时期中绝大部分地区内处于和平状态。加之明朝当局，特别是开国皇帝朱元璋，重视总结历史经验、改进治国政策，这使其生产力、社会经济、文化思想、治国方略等，皆比前代有所前进。举其要者，有如下六点。

(一) 生产力有所提高：包括农业上引进了甘薯、玉米、烟草等新品种；手工业出现了斗彩、五彩等新的彩瓷品种，套印、痘板、拱花等新的印刷工艺，以及用竹竿排放瓦斯等采矿技术上的新发明。

(二) 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包括明代中后期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中，为出卖而生产的商品性生产空前增多；商路贯穿东西南北；商业繁荣的城市和市镇大量出现；商业资本相当活跃，徽商、晋商中资本多者可至白银百万以上；南京和苏州等个别地方，居民的生活用品基本依赖市场等。在此基础上，主要在东南地区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现象。

(三) 出现了与商品经济繁荣相适应的新思潮：包括反对孔孟说教束缚、主张思想自由；反对夫权、主张男女平等、否定旧礼教；鼓吹工商皆本，肯定追求私利等。

(四) 对传统学术和科学技术知识进行大总结：包括总结和保存古代文献的《永乐大典》的编纂，总结明代及明代以前医药学、农学以及手工业技术知识的《本草纲目》、《农政全书》、《天工开物》的编著等。

(五) 分散和削减地方官吏及朝廷各部门官吏的职权，建立其互相制约的制度，并削夺地方藩王的参政权与统军权，从而使文武官员、地方藩王等不易发动叛乱，为政局之稳定创造了有利条件。

(六) 永乐至宣德年间以郑和为首的船队七下西洋，空前扩大了中国船队的远洋航行范围。

对一个朝代或一个历史时期，判断其历史地位是否应予肯定，所应加以考察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它与前朝或以前的历史时期相比，是否作出了新贡献。明朝与以前的历史时期相比，既然已经作出了如上新贡献，并且如上新贡献皆非等闲之事，或为更上层楼，或为具有时代意义，或为活动范围之大拓展，显然对于其地位理应予以肯定，而作为炎黄子孙言念及此，自然极为喜悦。

二、以“当代”的角度对比中外：富强先进，值得自豪

在 15 世纪以前，世界各国间虽有漂洋过海的洲际间相互往来，但这是非经常性的，而且一直没有实现所有大陆间的顺畅通航。因而各个国家大体是在海洋的限隔下，按地区处于相互分割的封闭状态，各自相对独立地发展，国际交往大体局限于所在的地区。但到 15 世纪末至 16 世纪初，亦即明朝进入中期后，欧洲人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进行了环球航行。从此世界海上航路大开，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西欧国家的殖民者先后漂洋过海来到世界的东方，包括来到中国，与中国开始了交往，于是各地区间的封闭状态被打破，地球村开始形成。时代的这一巨变，使得对一个国家的评价，就不能再同以往那样只从或主要从其本身的前后变化这一回头看的角度去着眼，而是也要从“当代”的角度，即适应世界的新变化从其与世界各国相对比而存在的角度去观察，如此才能更准确地把握其发展程度和所处的地位，从而得出准确的评判。借用这一角度去观察明朝，当会发现此时的中国在世界范围内乃属富强先进之列。其主要表现有如下六点。

（一）在纺织、冶金等当时的工业主导部门和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之中，中国的生产力水平高于欧洲。如中国织造丝绸的技艺，为同时代欧洲人所望尘莫及，西人圣奥宾曾慨叹：“世上没任何一个国家其工艺会如此精湛”。^① 17 世纪上半叶成书的中国人方以智著《物理小识》卷 7，记载了炼焦以炼铁的方法，而欧洲至 18 世纪才开始炼焦。^② 这显示了中国炼铁技术的高超。明代中国已大量生产金属锌（当时称倭铅），此早于欧洲四个世纪。^③ 在耕作制度方面，进入十七世纪，欧洲绝大多数可耕地仍以休耕来恢复地力，每年处于休闲状态者约有五分之二的面积，而这时的中国甚至已经出现了两熟或三熟的复种地区。据估算，中国晚明江苏、湖北、广东和广西，平均亩

^① 沃尔夫：《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伦敦 1935 年版，转引自张铠：《晚明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载《中国史研究》，1988 年第 3 期。

^② 北京大学物理系编：《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大事记》，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8 年，第 130 页。

^③ 本书编写组编：《自然科学大事年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年，第 23 页。

产量为 354 斤。^① 而英国在 200 年后的 1820 年，亩产不过 188 斤。^②

(二) 中国是世界市场商品的重要来源国。由于中国的生产技艺高超，成本低廉，因而产品出售价格低廉，如在中国缫丝业产品所要价钱约是“在西方所付同类产品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③ 这使在当时的世界贸易中，中国输出商品的种类和数量远超欧洲各国，欧洲各国围绕着中国货源而进行的各种形式的转贩贸易，成为这时东西方商业交往的重要内容。(参见上揭沈定平文) 而西方商人在与中国的贸易中，除白银外很少有其他货物可作支付手段，于是只好以银易货，中国成为出超之国。据统计，从隆庆改元中国重开海禁到明末的七八十年间，仅经菲律宾流入中国的白银，不下 4000 多万库平两，相当中国原有银量的六分之一。^④ 由于中国商品之大量传入欧洲，对欧洲人的生活习惯甚至发生了影响。欧洲权贵之家，以陈设中国漆器、屏风、雕花镂空家具等为荣，妇女沙龙聚会要手摇中国折扇，瓷也渐渐进入百姓之家。1600 年巴黎上演的一出戏剧中，主人公竟惊呼一股中国热正席卷欧洲。(参见上揭张铠文)

(三) 中国的富饶受到西方教士的盛赞。明后期来到中国的外国传教士，在其寄回国内的书信中，或者在其所撰著作中，常常赞扬中国的富饶。如范利安在其编撰的《圣方济各·沙勿略传》中，曾列举中国的七大优越性，其中之一即是认为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比它富饶和丰衣足食。^⑤ 利玛窦在其 1584 年 9 月 13 日写给西班牙税务司司长罗曼的信中，用赞赏的口吻说：“中国土地的肥沃、美丽、富有和中国人的智识与能力，真是卓越异常，太高太大了。”^⑥ 西班牙神甫门多萨也在其著作中提出，中国可以享有世界上最富饶国度的美名。^⑦

(四) 中国的行政体制受到西方教士的盛赞。如范利安在其编撰的《圣方

^① 珀金斯著，宋海文等译：《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年，转引自张铠：《晚明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载《中国史研究》，1988 年第 3 期。

^② 格里格：《人口增长与农业变革》，剑桥 1980 年出版，转引自张铠：《晚明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载《中国史研究》，1988 年第 3 期。

^③ 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上册，第 13—14 页，转引自沈定平《从国际市场的商品竞争看明清之际的生产发展水平》，载《中国史研究》1988 年第 3 期。

^④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 年，转引自上揭沈定平文。

^⑤ 参见沈定平：《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年，第 191 页。

^⑥ 利玛窦著，罗渔译：《利玛窦书信集》上册，台北：光启出版社、辅仁大学出版社，1986 年，第 47 页。

^⑦ 门多萨著，何高济译：《中华大帝国史》，北京：中华书局，1998 年，第 8—14 页；并请参看上揭张铠文。

济各·沙勿略传》中肯定明朝当官只能通过考试，认为明朝普遍的秩序井然，是迄今他在世界所见到的政府形式中最有条不紊的。^① 利玛窦在上文提及的那封信中，赞扬“中国政府治国的能力超出其他所有的国家，他们竭尽所能，以极度的智慧治理百姓”。（上揭罗渔所译书）1588年出版的马菲撰《16世纪印度史》第六册对中国进行介绍，其中称赞过中国的富饶和文明后，又特别对中国的科举制度大加颂扬，认为科举入仕制度使中国不存在世袭贵族，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奠基者”。^②

（五）外国侵略者武力侵犯中国的活动皆受到明朝的有力抵御。当时日本武士、商人和浪人在中国沿海进行海盗活动，被称为“倭寇”，这是明朝的一大边患，自明朝建国之初起，威胁中国约二百年。在万历年间，日本甚至倾全国之力发动侵略与明朝有朝贡关系的朝鲜的战争，有进一步为患明朝的危险。然而在明朝的抵御下，倭寇经常遭到大大小小的挫折，并在嘉靖年间终被基本平息。万历年间日本发动的侵朝战争，也因明朝的出兵朝鲜半岛，而遭到彻底失败。除日本外，武力侵犯明朝的还有西方殖民者葡萄牙、荷兰等。如所周知，当时西方殖民者已用武力征服了美洲、亚洲的许多国家，但是，在明朝的抵御下，葡、荷等西方殖民者对中国的武力进犯骚扰范围，只能限于沿海地区，并不能深入中国的内地，而且在沿海地区的武力侵犯骚扰，最终也被先后驱逐。如此等等，在在显示了明朝国力之强盛不亚于世界上任何国家。

（六）西方传教士在明朝被迫采取了非强迫的传教活动方式。自地理大发现以后，西方殖民者走向了全世界，与之相伴随，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也在全世界展开起来。这些传教士到达一些地区（如美洲）后，由于当地居民处于落后状态，其国家实力弱小，于是采用了强迫传教的方式，强迫当地人一切遵从欧洲的习惯和办法行事，甚至强力集中当地儿童，使之与外界隔绝，完全按照欧洲人的样式生活，连说话也要改用欧洲的语言。但对于明朝，西方传教士则改用适应当地情况的灵活方式以传教。他们不是要求中国人欧洲化，而是反过来他们主动中国化——学中国语，穿中国服，读中国书，力求与中国人打成一片；热心传授西方先进于中国的一些科学技术知识，以获得中国人的好感；甚至尽量用中国儒家经典中现成的词语翻译基督教的著作、允许中国教徒保留某些与基督教教义中非根本部分并不一致的习俗。这种适

^① 参见沈定平：《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第192页。

^② 参见张国刚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94页。

应当地情况的灵活传教方式，在一定意义上说，可称之为委曲求全。西方传教士为什么这样委曲求全？不言而喻，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实力太大，使之不得不如此。

以上六点表明，明朝时的中国，生产水平高低、经济发达程度、行政体制之完善状况以及综合国力的大小，与包括西来各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相比，多有超越之处，称之为富强先进，实不过分。作为炎黄子孙言念于此，岂能不自觉脸上有光、称明朝为值得自豪！

三、以“未来”的角度注视后果：丢失机遇，留有遗憾

任何事物都不会是十全十美的，而难免有负面的因素。明朝作为一个朝代，除去光亮的主要方面外，也有灰暗而令人遗憾之处。诸如禁止宦官干政以防止管理集团内部纷争的方针未能贯彻始终、注重休养生息而使民众安居乐业和社会安定的政策在中后期渐有削弱等，皆是明朝灰暗而留有遗憾之处。但在其时世界已逐渐形成地球村、各国家民族地位处境面临重新洗牌的新形势下，明朝对此带根本性的、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新问题反应迟钝，丢失机遇，结果使明朝以后的中国受此牵连，蒙受了少有的挫折和灾难。明朝的这一灰暗而留有遗憾之处，在其所有灰暗而留有遗憾之处中，影响最大，最应关注。本文前两部分在叙述明朝的光亮面时，皆采取举其要者的办法，这一部分叙述明朝的灰暗处，亦采用这种办法，仅从“未来”的角度，集中讨论明朝对世界新形势反应迟钝、丢失机遇而造成不良后果的缺憾。

地理大发现后，摆在明朝面前处理国际关系的道路有两条，一是充分利用地理大发现后提供的活动范围可大大扩大的机会，大胆走出去，以整个世界为自己的活动舞台；二是对地理大发现后活动范围可以大大扩大的现实状况视而不见，而安于原来的利用朝贡关系建立起来的天朝上国即地区性大国地位，继续将自己的活动范围局限于附近地区。

当时走第一条道路即以全世界为活动舞台的国家，主要进行两种活动，包括征服其他国家、建立殖民地，所到之处搞商业贸易。这两种活动一可以迅速增加本国的财富，二可以大大促进本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特别是促进本国武器装备的改进。因为征服了其他国家，进而必然是对被征服者进行财富掠夺；进行商业贸易者，一定会利用地区差价大获利润，如此等等自然会使本国财富迅速增加。而为了提高征服能力、减少商业贸易

成本、保护远在异域的商业安全，又必然对迅速提高本国的科学技术水平、生产力水平、特别是武器装备性能提出强烈的要求，从而使之成为现实。此外，即使不搞上述两种活动，只要注意以全世界为活动舞台，其开扩眼界之益，也会有利于本国科学技术、生产力、武器装备性能的提高。由此看来，这条以全世界为活动舞台的道路，是迅速富国强兵之路，即便从道义出发不搞对其他国家的征服，只要走这条道路也能收到较快富国强兵的效果。

按照当时的实际，明朝对当时的国际新形势缺乏认识，选择的道路是第二条，即对地区外的事情漠不关心，继续坚持局限于与周边国家保持朝贡关系，安于地区性大国的地位。这便使自己与新形势带来的迅猛发展机会擦肩而过。不可讳言，其时西方传教士曾给中国带来了一些科学技术知识，包括西方的火器技术，但这毕竟数量有限，远不如自己走向世界舞台所得为大。当时，特别是隆庆元年开放海禁后，中国的民间商人到日本和东南亚进行商业贸易者数量亦称可观，但此种商业贸易毕竟属于私人行为，规模有限，远不如由朝廷大力推进得利为多。

明朝放过了新形势带来的迅猛发展的机会，而西方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却紧紧抓住了这一时机。这使国力的对比，不能不开始向着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变化。在明朝存在的时期内，如前所述，中国继续保持了世界富强先进国家的地位，这当是由于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的缘故。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发展速度虽然由此开始逐渐向中国低于西方国家的方向变化，而西方国家的实际发展水平要赶上以至超过中国，尚需时日。

然而，倘若我们将目光移向明朝的“未来”即清朝，则可发现，西方国家赶上以至超过中国的情形终于不幸实现了。清朝入关后，继续沿着明朝处理国际关系的老路，坚持局限于与周边国家保持朝贡关系，安于充当地区性大国的地位，不关心地区外的事物。于是，中国的富强先进地位继续下滑。18世纪欧洲出现了技术革命，这是欧洲科学技术和生产力超过中国的重要标志。在此前后，眼界狭窄的清朝在武器装备上以骑射为根本而固守之，不重视火器的改进，而欧洲的火器船舰技术却在突飞猛进地发展。1742年英国人罗宾斯所著《枪炮术原理》一书出版，为近代枪炮技术提供了理论基础。^① 其枪炮的制作先后完成了由滑膛向线膛、由前装到后装等变化，命中率和威力皆大有提高。1778年英国人研制出短炮身、大口径、少量火药发射大弹丸的舰

^① 许锡辉：《日新月异的矛与盾》，广州：花城出版社，1981年，第5页。